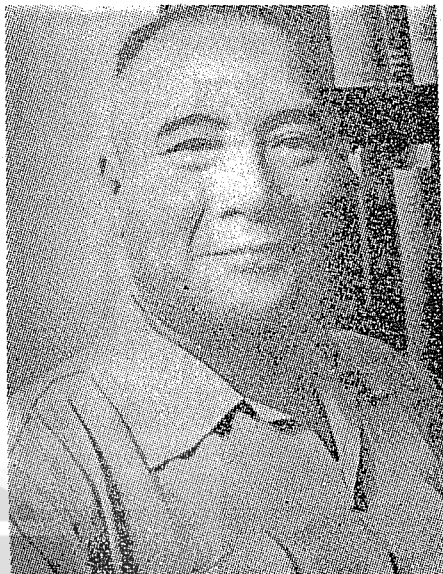


(二) 細說張國燾



上圖為張國燾晚年的照相

細說張國燾(二)

· 費雲文 ·

為國共合作鬧意見

國民黨與中共第一次合作在醞釀的期間，張國燾曾經強烈的反對。

民國十一年前後中國共產黨雖然已經成立，畢竟還是僅有幾十個黨員的小集團，仍難獨自舉步的發揮「革命」力量；因此，共產國際想到利用國民黨，曾經派人向孫中山先生提起「聯合戰線」的建議，遭到嚴詞拒絕，於是另外設計一條路線，那就是鑽到已有長期奮鬥歷史的中國國民黨裏去寄生、發育、壯大。而為達成此一目標來華接洽奔走的，就是馬林(Maring)。

可是，當馬林于民國十一年(一九二二)年八月在杭州西湖召開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」，用冠冕堂皇的語調提出此案時，却遭遇到陳獨秀、張國燾、蔡和森、高尙德等人的反對。以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，會沖淡了共產黨的階級性，損

害了共產黨的獨立性。經過馬林以「利用國民黨名義，才能吸收到羣衆，拉攏國民黨左派，可以造成國民黨的分裂」為由，加以勸說，並且用「服從共產國際的權威」責成壓制，當時陳獨秀已提出「有條件的服從」；惟有張國燾堅持己見，不稍讓步。激動馬林怒火，竟以張與蔡、高搞黨內小組織為由，聲色俱厲的對張國燾大施壓力；張也還以顏色，指斥他發言無禮而荒謬。

「西湖會議」後五天，陳獨秀、李大釗和馬林分別前往拜訪孫中山先生。孫先生當即贊成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參加國民黨，以促成國共合作的主張。再幾天後，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和森、張太雷等，由張繼介紹，正式加入國民黨為黨員。九月初，張國燾也由陳獨秀介紹，加入國民黨為黨員。

國共第一次合作，在馬林的撮合之下，又有蘇俄外交官越飛與孫中山先生在上海相見之事。

雙方經過長期會談，于民國十二(一九二三)年一月廿六日發表「孫越宣言」，主要闡明：「蘇俄對國民黨的援助，是為達成民國統一與國家獨立；共產主義不能在中國實行；蘇俄先前宣佈的『放棄對華一切特權』，仍然有效。」

五月，馬林從莫斯科返回上海，攜有共產國際給「中共中央」的特別訓令；要求中共立即擴大與國民黨的合作，並提議中共從速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。

共產國際給「中共中央」的特別訓令各要點為：

1. 國民革命是中國革命當前的中心任務。
2. 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重心，中共黨員應加入國民黨，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；以期實現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——軍閥在中國的統治。
3. 中共在這一國民革命中，仍應保留組織的

獨立和政治批評的自由。
4. 職工運動仍是一個獨立的運動，中共應積極促進其發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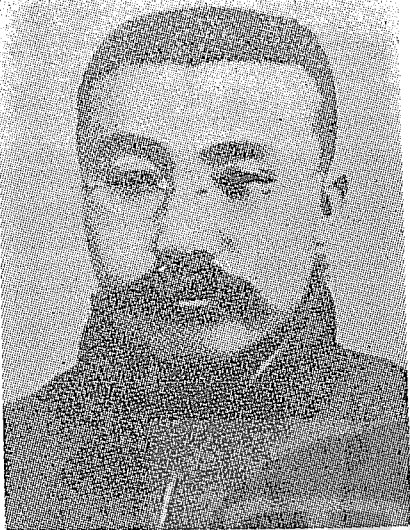
馬林並曾向張國燾特別加以解釋這一訓令的基本精神，是以完成國民革命為中心任務，所以

1. 所有中共黨員均應加入國民黨，並在國民黨內積極工作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。

2. 所謂組織獨立與政治批評自由，不可過於強調；以免有損國共合作。

3. 職工運動也是國民革命的一部份，中共黨員應該吸引大量工人參加國民黨；俾能接受國民革命的領導。中共至多只能在工人中間進行一些階級教育。

此一解釋，遭到張國燾的強烈反對，他以為



民國十三年與張國燾一同到廣州的中共創始人之一李大釗。

1. 國民革命只是一個中心任務，並不是中共的唯一任務；除國民革命外，中共還有階級鬥爭。

2. 不必全體黨員都加入國民黨，尤其是中共各級領導工作者和職工運動者；以「保留組織獨立」，即使在國民黨內工作者，也不可隨聲附和，喪失他共產黨的原來面目。

3. 職工運動，是中共所領導的獨立運動；不能領導其成為國民黨的職工運動。

4. 馬林的解釋，顯已違反共產國際「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不應與國民黨合併……不可隱藏自己特殊的旗幟」等決議。

雙方爭論至為激烈，馬林指斥張國燾仍保留過去建立國共聯合戰線的左傾思想，輕視國民革命，反對加入國民黨的基本政策。張則指斥馬林犯了右傾主義錯誤，企圖取消中共獨立，使中共成為國民黨的左翼，不僅忽視中國工人階級的作用，也有害於國民革命勢力的團結。

馬林以代表共產國際的資格，挾「訓令」的權威，對張國燾大施壓力；張則以「中共中央」委員地位強項的反抗，雙方怒形於色，幾乎動武。

於是，陳獨秀從中加以協調，要求雙方互相讓步，最後終在大會中以九票對八票，一票之差，通過了陳獨秀的提議：

「全體黨員均應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，但一部份中共黨員可在國民黨內擔任實際工作，尤其是負中共各級領導工作的同志，不應兼任國民黨的職務，以免混淆中共的

獨立面目。同時，爲了加強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影響起見，中共應幫助國民黨增加工農黨員，發展其工農羣衆中的組織」。

結果，大會宣言中，祇表示「承認國民黨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，並希望社會上的革命份子，都集中到國民黨來」；即刪去馬林原擬提出的：「一切工作歸國民黨」、「各項革命工作都是國民黨工作的一部份」等語句。

馬林雖然同意陳獨秀此一措施，但却對張國燾不予諒解，向與會代表大肆指責張反對陳獨秀的領導，違反共產國際的訓令，破壞黨內團結，應予嚴重懲戒。影響所及，此次大會改選「中共中央」委員，張國燾竟然榜上無名被排斥出局。（按：當選者爲陳獨秀、李大釗、蔡和森、毛澤東、瞿秋白。毛澤東接替張爲組織部長）

此一結果，據張國燾後來的回憶，他認爲：「我是中共重要創始人之一，也是『中共中央』的正統，地位僅次於陳獨秀。就因爲在西湖會議上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，從此由中共的正統派要人，降爲反對派的首腦。機會主義者，反共產國際和右派等帽子，都戴到我的頭上，這事的確是我政治生涯中的一個重要關鍵」。

國父對他大度包容

陳獨秀不贊成馬林排斥反對者的態度，同時也受到黨內反對意見的壓力；於是希望由「中共中央」分派張國燾一項重要工作，最好回到北京去担任鐵路工會的領導工作，從速建立起「全國

鐵路總工會」。

張國燾接受這項工作，于民國十二（一九二三年）九月回到北京，在李大釗友善的協助下，進行順利。

十一月初，胡定康再來中國，接替馬林共產國際代表的位置，特地和張國燾談起馬林。他表示共產國際並不贊成馬林的作法，並說：「加入國民黨，正是實現聯合戰線的具體方式。中共加入到國民黨裏面去，不是遇事聽命於國民黨，或成爲國民黨的左翼；而是要支持和團結國民黨內的革命派，反對國民黨中不革命的份子」。同時，對張曾受馬林打擊，表示同情。

北方的政局，因爲曹錕賄選總統，愈演愈壞；一般青年很熱烈的傾向國民黨，而使國民黨的組織在北京的發展蓬勃起來。因此，張國燾對國共合作的前途表示樂觀；曾經應國民黨在北京的機關報「新民國」雜誌之邀，發表「廣州新氣象」一文，號召所有革命份子合作。

民國十三（一九二四）年初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，張國燾當選爲北京代表。偕同李大釗於一月十日到達廣州。當他從蘇俄顧問鮑羅廷之處看到已經草擬的國民黨黨章的草案時，特別敏感的顧慮到中共黨員的立足安全，他主張：「國民黨黨章應儘量擴大民主，黨員除應遵守國民革命的政綱之外，可以有不同的意見存在；如此，跨黨的共產黨員才能立足」。這與當時大家的主張：「一個國民革命的政黨，應該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黨，才能負担起它的歷史使命」大相逕庭，就是一些中共的同志，也把

他看成是一個對國共合作專潑冷水的。

開大會以前的某一個晚上，他參加了孫中山先生所舉行的宴會。孫先生即席發表演說；他以此爲：

「俄國革命的勝利，是得力於俄國共產黨組織的堅強，但其所標榜的共產主義却失敗了。俄國現行的新經濟政策，與太平天國所實行的天朝田畝制是相類似的。俄國尚不能實行共產主義；那麼，中國實行三民主義是最恰當了。」

同時，他更否定「階級鬥爭」之說，他以為「在中國祇有大貧與小貧的區別，並無階級的顯明分別」。

中山先生「希望將所有的革命者都團結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」的偉大胸襟抱負，並未能感悟張國燾。張却藉口趕在二月七日以前回到北京，舉行「全國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；不待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開完，先行離開廣州。

中山先生知道此事，乃于一月廿二日晚約他晤談，不但未因他提前退席而稍存芥蒂，並且對他熱心職工運動，多所慰勉；當夜，特派親信人員送張一函，附有二千銀元，托他捐贈給「鐵路總工會」，祝賀此次「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的成功，預期張國燾個人工作，能順利發展。甚至還支持張國燾當選爲第一屆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。中山先生如此恢宏氣度，不愧爲一賢明的革命領袖。

張國燾回到北京，「鐵路工人代表大會」如期於二月七日祕密舉行，到會代表廿人，張向大

會發表演講，提出「工人應擁護國民革命，力爭工會自由和改善工人生活」等主張；並以大會名義，致函中山先生，感謝他支援鐵路工人的盛意。當即成立「全國鐵路總工會」，以鄧培爲委員長，張國燾爲總幹事，在北京設辦事處。

國民黨北京執行部也很快成立，中央委員丁維汾、王法勤、李大釗、于樹德等經常在部辦公；張國燾也常去參加會議、辦公。

五月十五日，有人以炸彈偽裝禮品，送到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家，炸傷顧家僕人三人，引起北京當局大捕革命黨人之事。他們以爲北京的民衆運動，鐵路工人的活躍，都是革命黨人幹的；同時國共兩黨素來反對顧維鈞的對俄政策，因此判定顧宅炸彈案，一定也是國共黨人所爲。而張國燾又是國民黨公佈的候補中央委員，於是張國燾夫婦被捕入獄。（張的太太楊子烈，是中共最早的女黨員，是年二月剛與張結婚，正担任「新民國月刊」的校對和發行工作。）接受軍法審判，永遠監禁。

十月，直奉二次戰爭爆發，廿三日，馮玉祥反戈入北京，囚禁曹錕，暫時控制了北京局勢。廿五日，張國燾夫婦才獲得「無罪開釋」。

張出獄以後，主要任務，仍是領導鐵路工會。民國十四（一九二五）年一月，中共在上海舉行第四次代表大會，張沒有出席，但仍重新當選爲中央委員，主持「中央職工委員會」。

「中央職工會」委員有李立三、劉少奇、鄧中夏、項英、林育南、李啓漢、王荷波等；張國燾爲主任委員，主持決策；日常工作，由劉少奇

助理。

民國十四(一九二五)年五月一日，由北方的「全國鐵路總工會」、華中的「漢冶萍總工會」、廣州的「工人代表會」、香港的「海員工會」出名召集的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」在廣州舉行，當天的「勞動節紀念大會」有五萬人參加，會後示威遊行，除各行各業的工人外，還有廣州四郊的農民和市内各校學生，情緒熱烈。大會推選廿五人組成「中華全國總工會」，林偉民為執行委員長，劉少奇、劉文松為副執行委員長，張國燾被選為上海辦事處處長。

張國燾即利用此一職務，在「五卅」運動時，迅速成立「上海總工會」，推動工作。

「五卅」運動結束後，「中共中央」成立軍事部，由張兼任部長。

北伐潛赴武漢活動

關於中共滲透到國民黨內，與風作浪之事；在中共第四次大會時，即有「要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」的決議。自孫中山先生北上逝世後，在蘇俄顧問鮑羅廷翻雲覆雨、跋扈險的操縱運用下，愈演愈烈，終有民國十五(一九二六)年三月廿日「中山艦事件」的發生。

當時，國民政府已在廣山成立，黃埔軍校校長兼廣州衛戍司令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蔣中正正準備北伐，中山艦長中共黨徒李之龍，受人指示，想乘蔣校長搭乘該艦由廣州返回黃埔時，強迫他離粵，直駛灣參威，送往俄國，以消除共黨竊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唯一障礙，阻撓北伐。幸

被蔣校長事先發覺，立即出動部隊，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的共黨份子，收回中山艦，搜繳共黨份子所操縱的「省港罷工委員會」的槍械，包圍各俄國顧問住所，監視其行動。十四日，國民政府解除俄國顧問十餘人的聘約；廿四日，季山嘉(軍事顧問)等人離華返俄。

事變結束後，鮑羅廷匆匆自俄國趕回廣州(三月廿日，鮑羅廷適在俄國)，根據史達林的意圖，探退讓妥協態度。

在廣州的中共黨徒，原先很憤怒，本想聯絡各方勢力，反擊蔣校長。但蘇俄已採取退讓辦法；仍然留在廣州的俄國顧問，也對蔣校長很恭順。於是，由上海趕往廣州的張國燾，在中共廣東區委會緊急會議上，報告「中共中央」決定採取妥協政策。接着，他和周恩來晉見蔣校長，氣氛融洽。據他事後回想說：「那次談話，至少明白表示了並無徹底排斥中共的意向」。

等到蔣校長所提出的「整理黨務辦法」，在鮑羅廷相當尊重的氣氛下，獲得協議，並經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委員全體會議通過後，幾顆破裂的國共關係，終於漸漸的緩和了。

共黨的陰謀既已失敗，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。五月廿一日，國民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，決定北伐。七月九日，蔣校長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誓師北伐。

北伐軍進展神速，九月七日，已攻佔漢口、漢陽，並已對武昌之敵形成包圍。張國燾等在「中共中央」緊急會議上建議將「中共中央」遷移到武漢去，未能通過；但却決議派張為全權代表

趕往武漢，指導湖北區委、發展工農勢力，團結國民黨左派，爭取北伐勝利；一直到十二月間鮑羅廷到武漢以前，中共在武漢的工作，都是由張直接負責。

當時，張國燾忙於積極增加工農勢力的比重，「中共中央」也陸續調動得力黨員多人；工運方面劉少奇、李立三，軍事方面李和林、惲代英、農運方面毛澤東等來武漢。由於工作的繁重，十一月，張又兼任中共湖北區委書記的職務。

十月十日，在漢口成立「湖北省總工會」，選舉向張忠發為委員長，李立三、劉少奇，項英為副委員長。(適逢國民革命軍攻克武漢更增加工人的狂熱情緒)總工會之下，設有工人糾察隊。

中共的工會運動雖然發展蓬勃，但幹部們却發生過份左傾的蠻幹偏差，勞資爭議和罷工浪潮，隨着組織的發展而洶湧起來。工人不但常用暴力手段，不可理喻的對資方橫施壓力，甚至有拘捕人員，戴高帽子遊街等事件；而且自己也不遵守勞動紀律，工會負責人往往因工會的活動，妨礙了自身在工廠的工作；其他工人店員，也有在工作時間內不聽資方指示和工作不力等情事，嚴重的影響到社會安定和生產的正常供應。

於是，「實行共產」的謠言到處流傳，而「反共」的意趣，也因以普遍的醞釀，逐漸形成。

十二月，鮑羅廷偕同部份國民政府要人抵達武漢，以後，開始「反蔣運動」。這是鮑羅廷在史達林的授意下，主動發動的。因為上年三月廿日「中山艦事變」俄共對蔣校長的讓步妥協，祇

是一種臨時的退却；現在，他們以為「反蔣」的時機已經成熟，所以鮑羅廷也不再隱藏此一忍耐已久的「反蔣決心」，而放手大幹一場了。

因此，當張國燾去見鮑羅廷，鮑羅廷即表示：「好了，我們又在一個新地方晤面了。我們要開始新的生活，做一篇新文章。」在廣州時，我曾說過北伐到北京，國共便要分家；現在看來，分家已經大為提早了。

在鮑羅廷陰謀操縱，中共推波助瀾之下，「反蔣」手段的毒辣，是無所不用甚極的。

當蔣總司令指揮國民革命軍，二、六兩軍進攻南京時，鮑羅廷竟然授意在武漢被左派把持的「國民政府」，密令第六軍軍長程潛，逮捕蔣總司令，以免他于攻克南京後，建立一個足以抗衡武漢的政治中心。同時，共產國際也有訓令：「必須設計一切方法，激動國民羣衆，排斥外國人。」張國燾除了鼓勵第六軍的政治部出任中共黨員林祖涵，配合行動外；並立即以機密方法，通知上海「中共中央」，就近協助程潛。

結果，程潛未能逮捕蔣總司令，林祖涵却于三日廿四日攻克南京時，指使中共黨徒，鼓勵地痞流氓及潰兵，假扮國民革命軍，于上午九時起侵入英美領事館，殺害館員，侵入教堂，殺害外國傳教士，搶劫金錢物品，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。

下午三時半，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美軍艦，砲轟南京城，示威洩憤。一直等到程潛和第二代軍長魯滌平進城，出面收拾，事態才告平息。

蔣總司令聞知此事，乃于廿五日命令何應欽

、程潛、魯滌平、賀耀祖等負責維持南京治安，保護外僑生命財產。并于卅一日在上海招待英、美、德、法等國報社記者，申明國民革命軍的立場，是求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，決不以暴力方式，達到取消不平等條約與收回租界的目的；對在華的外僑生命財產，負責保護。但也表示對此次英美軍艦砲轟南京，將要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賠償損失。

上海方面，當國民革命軍展開攻勢行動時，上海的國民黨組織領導勞動羣衆實行罷工，以為響應。

中共黨徒乃乘機組織「工人糾察隊」，擁有槍械；企圖發起暴動，成立勞工市政府，挑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。蔣總司令進駐上海後，爲了防制共黨的暴動，爲了不使上海成爲武漢之

續；他所指揮的國民革命軍乃與工會、商會合作，于四月十二日收繳大約三千多人的「工人糾察隊」的槍械，監視中共煽亂分子。上海才告安定。四月十八日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與國民政府委員會秉承孫中山先生遺志，定都南京。五月五日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，通過清黨原則，七日組織清黨委員會，制定排除共產黨員的「清黨條例」，通告各地黨部。於是，上海、南京、江蘇、浙江、福建、安徽、廣東、廣西、四川各省都開始實施清黨。中共份子乃不能再從事公開活動，多數逃往武漢。

顯而易見，鮑羅廷與中共搞的「反蔣運動」，以及共產國際希望挑起國民革命軍與列強的衝突，引起列強出面阻撓蔣總司令控制東南的陰謀，徹底失敗了。
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册合售一二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爲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、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上冊60元下冊70元合售一二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